

吕著中国通史（下部） 一 吕思勉 著

中国政治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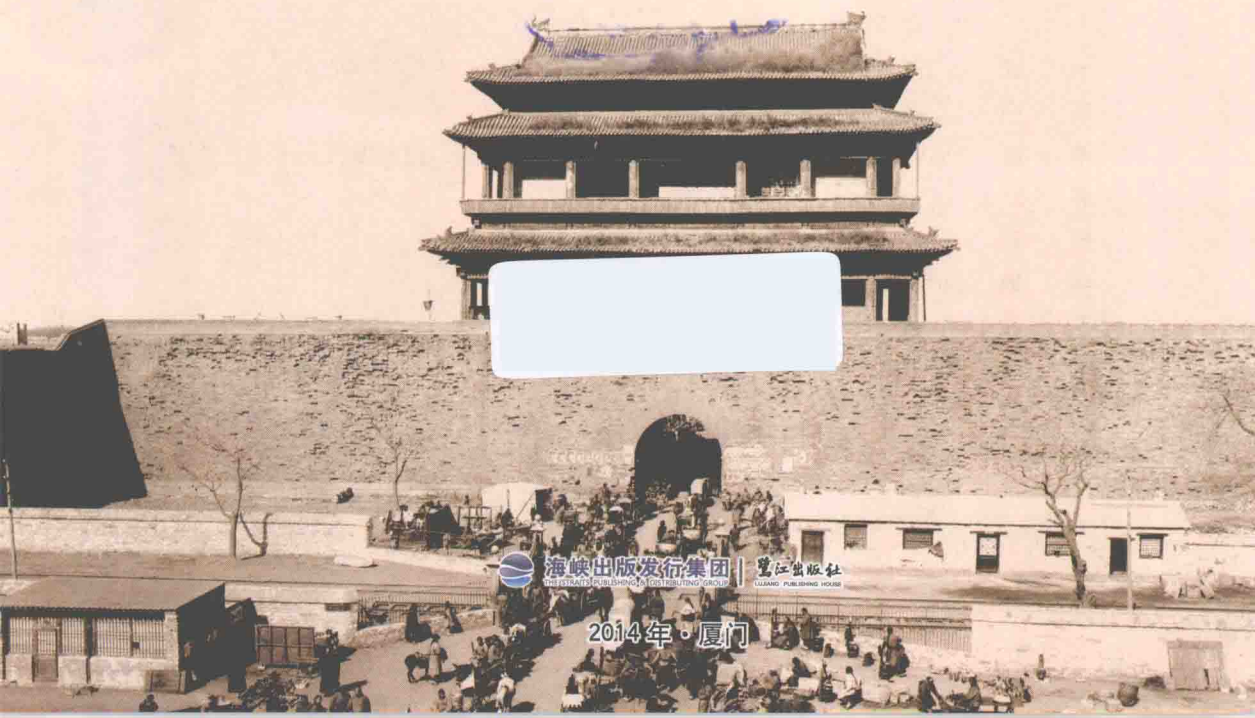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GROUP

鹭江出版社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吕著中国通史（下部）

中国政治史

吕思勉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HAIKUAN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

鹭江出版社
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4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政治史 ; 吕著中国通史 : 下部 / 吕思勉著. — 厦门 : 鹭江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459-0728-5

I. ①中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政治制度史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 D69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6422 号

ZHONGGUO ZHENGZHISHI

中国政治史

吕著中国通史 (下部)

吕思勉 著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北街 300 米工业园内

邮政编码: 101109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8

字数: 23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59-0728-5

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

春秋五霸争战图。



太公望点兵。

导 读

我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。千百年来，史籍编撰赓续不断，史部之书几于汗牛充栋。但像今日大中学校里讲授的“中国通史”，则由来不久。若从梁启超倡议“新史学”算起，新式通史的著述也只是一百多年的历史。1947年出版的顾颉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在回顾新式通史的著述成绩时说：所有的著述“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”的还很少，其中“较近理想的，有吕思勉《白话本国史》《中国通史》^①、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、陈恭禄《中国史》、缪凤林《中国通史纲要》、张荫麟《中国史纲》、钱穆《国史大纲》等”。^②值得注意的是，顾先生所列的七种较近理想的中国通史著述，吕思勉先生的著述就有二种。

吕先生的《白话本国史》与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都是为历史教学或青年自修历史而编写的。《白话本国史》写于上世纪20年代初，时先生任教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。《吕著中国通史》写于上世纪30年代末，时其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，是他在历年授课教案的基础上加以增损而编定，用作大学文科学生的课本。吕先生的这两部中国通史，先后相隔二十来年，在撰写的体例和风格上已有较大的变化。《白话本国史》采用严整的章节体裁，写法上是考史与叙事兼用，故有较多

① 即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。

② 顾颉刚：《中国当代史学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77页。



的考证文字，征引的史料也翔实丰富；为便于读者的学习，书中又附有大量的注释，或用来注明史料的出处和进一步阅读的书目，或记注必要的文史知识和古今地名，是初学中国史的最佳入门书。《吕著中国通史》采用专题式的体例，写法上是叙事与议论并重，故有较多的议论文字，叙述力求扼要，行文力求浅显，多引用当年各种社会科学的成果，是学习、研究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。

1938年，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，规定“中国通史”课的教学，须注重文化史的内容。为了适应“部颁课程”的要求，吕先生重新拟写了讲稿，编成这部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。他认为，大学生、尤其是大学文科的学生，他们在中学历史学习的基础上，正需要增加各方面有系统、有条理的历史知识，以适应进一步钻研的需要。而当时流行的各种通史著作，虽然在叙述历代治乱兴衰的过程中，夹叙了一些典章制度，但是往往缺乏系统，上下不够连贯，初学者不易掌握要点，不能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。为了克服这种毛病，他在编撰体例上做了一番改进。吕先生一向赞赏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把史事分为“理乱兴亡”和“典章经制”两大类的做法，说今日编撰中国通史，仍可借鉴这种方法，只是不该将它的范围限得太狭。由此，他把这部通史分为上、下两册，上册^③分门别类地、系统地叙述历史上的社会文化现象，内容包括婚姻、族制、政体、阶级、财产、官制、选举、赋税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货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十八大类；下册则分章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迁。这样的安排，既注重社会文化现象，又不至于遗漏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，也避免了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教学相重复。

吕先生论中国历史的演进，喜欢援引孔子的大同学说。他说：我国历史自大同进入小康后，社会还能算是一个准健康体；自小康再入乱世后，社会就进入病态了。所以，自先秦诸子开始，都想对社会有所改革，有的甚至想把社会彻底加

③ 《吕著中国通史》完稿于1939年，上册1940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，下册1944年9月出版。

以改造。这种改革的思想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，虽屡起屡蹶，而磅礴郁积，终于导致了王莽的改革。自王莽改革失败之后，“政治家的眼光，亦为之一变。根本之计，再也没有人敢提及。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，只能听其迁流所至。‘治天下不如安天下，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’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”。然而病态的社会，怎能听其流迁而只图苟安呢？吕先生曾说：

大凡一个读书的人，对于现社会，总是觉得不满足的，尤其是社会科学家，他必先对于现状，觉得不满，然后要求改革；要求改革，然后要想法子；要想法子，然后要研究学问。若其对于现状，本不知其为好为坏，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，又或明知其不好，而只想在现状之下，求个苟安，或者捞摸些好处，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，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？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，乃是治学问者，尤其是治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。^④

本着这样的认识，吕先生给《吕著中国通史》预定的目的是：“希望读了的人，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；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；对于前途，可以预加推测，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，可以有所启示。”他说：中国历代的社会改革思潮有两种，一种是儒家的主张，希望通过社会改革，达到“大同”，进入“太平世”，其具体的措施是恢复井田、平均地权；另一种是法家的主张，采取节制资本、盐铁官营、控制民间商业借贷的办法。但这两种主张都没有能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。历史的经验向我们启示：中国今日的社会改革，应着重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。社会经济的改革尤以农业为首要，但中国向来讲究农学的人太少，即使有之，亦和农民隔绝，学问不能见诸实用；又因土地私有，寸寸割裂，大农

④ 吕思勉：《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》，原刊1941年《中美日报》“堡垒”副刊第160—163期，现收入《吕思勉文集·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581—582页。



制难以推行；而公共事务的废弛、地方自治的不举等，都是农业进步的阻力。在政治制度上，应该发扬我国古代的民主政治制度。他说，“不论哪一国，其原始的政治，必为民主。后来虽因时势的变迁，专制政治逐渐兴起”；“中国的民主政治，虽然自己久有根基，而亲切的观感，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。代议政体，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。但代议政体，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，中国却无有。于是再急转直下，而成为现在的党治”。“然民主的制度，可以废坠，民主的原理，则终无灭绝之理。”“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”“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”的思想必能深入人心；他坚信自古以来的“磅礴郁积的民主思想”，必将待时势的来到而兴起。

《吕著中国通史》是在上海成为“孤岛”时撰写的，那正是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的年月，但吕先生对抗日胜利和国家重建充满了信心。在本书的最后一讲《革命途中的中国》里，他用“大器晚成”这句成语来预祝中国前途光明：“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，决无可以自存之理……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，诚极沉闷，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。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，数千年的大国、古国，没有前途之理？”书稿写毕于1941年“九·一八”之日，他借用梁启超所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为书的结语：

希腊啊！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，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娇。撒荳波，歌声高，女诗人，热情好。更有那德罗士、菲波士荣光常照。此地是艺文旧垒，技术中潮。祇今在否？算除却太阳光线，万般没了。

马拉顿前啊！山容缥缈。马拉顿后啊！海门环绕。如此好河山，也应有自由回照。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。难道我为奴为隶，今生便了？不信我为奴为隶，今生便了。

顾颉刚先生对吕先生的两部通史评价甚高。他说：“编著中国通史的人，最易犯的毛病，是条列史实，缺乏见解；其书无异为变相的《纲鉴辑览》或《纲鉴易知录》之类，极为枯燥。及吕思勉先生出，有鉴于此，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，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。他的书是《白话本国史》四册。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，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。又吕先生近著尚有《中国通史》二册，其体裁很是别致，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，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，叙述中兼有议论，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，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，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。”^⑤有哪些“石破天惊”之论呢？笔者不妨在此“晒一晒”读此书时抄录的一些段落：

不论何等组织，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，才能持久。小家庭制度，是否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应呢？历来有句俗话，叫作“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”。可见所谓家庭，实以扶养老者、抚育儿童，为其天职。然在今日，此等责任，不但苦于知识之不足（如看护病人，抚养、教育儿童，均须专门智识），实亦为其力量所不及（兼日力财力言之。如一主妇不易看顾多数儿童，兼操家政。又如医药、教育之费用，不易负担）。在古代，劳力重于资本，丁多即可致富，而在今日，则适成为穷困的原因……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，不忍坐视其灭亡，而家是中国人所尽力经营的……以爱家者之心论……正是极端利他心的表现。利他心是无一定形式的，在何种制度之下，即表现为何种形式。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拘制着它，一定只许它在这种制度中表现呢？（《中国文化史》第二讲 族制）

官僚阶级，总是以自利为先，国事为后的。无以防之，势必至于泛滥不可收拾……选举之法，无论如何严密，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。（一）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，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；（二）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；（三）又监督严密，小人亦可为善，监督松弛，中人不免为非；

^⑤ 顾颉刚：《中国当代史学》，第77页。



所以考课之法，实较选举更为重要。（《《中国文化史》第七讲 选举）

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。有私心，要把一群人团结为一党，互相护卫，以把持天下的权利，其结果，总是要自受其害的。军官世袭之制，后来腐败到无可挽救，即其一端……所以从历史上看来，从没有一支真正强盛到几十年的军队（因不遇强敌，甚或不遇战事，未至溃败决裂，是有的。然这只算是侥幸。极强大的军队，转瞬化为无用，这种事实，是举不胜举的……军队的腐败……虽有良将，亦无从整顿，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）。

（《《中国文化史》第九讲 兵制）

社会复杂了，各方面的矛盾，渐渐深刻，政治总只代表得一方面，其（一）反对方面，以及（二）虽非站在反对方面，而意在顾全公益的人，总不免有话说。这正是（一）有心求治者所乐闻，（二）即以手段而论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亦是秉政者所应希望其宣泄的。而始皇、李斯不知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”。误以为庶人不议，则天下有道；至少庶人不议，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，这就和时势相反了。（《《中国文化史》第十五讲 教育）

这样的议论，书中触目皆是，正等待读者去慢慢阅读，细细领会。人们常说“读史使人明智”“知古可以鉴今”，读读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你一定能感受到历史著作的这—种魅力。

顾先生说：中国通史之所以很少能达到理想的地步，那是因为中国史上需要考证的地方太多了，而以一人之力来撰写数千年的通史，那是件困难的事。严耕望先生论通史的撰述，以“通贯”和“周瞻”为最高境界。然而中国历史悠久，史料浩如烟海，要在区区数十万字的篇幅里，做到“通贯”而又“周瞻”，谈何容易！况且“通贯”与“周瞻”，总是难以两全。这是编撰中国通史的又一困难。事虽甚难，但“中国通史”的撰写却是急迫而又重要的事。1903年，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中批判旧史学有四弊：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，

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，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。梁氏认为，传统史学虽然发达，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，不过充当统治者的政治教科书；而国民却未能从中受到教益。为此，他倡议建立新史学，重写中国史，呼吁史学界撰写一种为国民而写、写国民历史，用为国民教科书的新国史。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努力，新史学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。但论起为国民写史、写国民的历史，且能用作国民历史教科书的，无疑这门“中国通史”的作用与影响厥功至伟。而吕先生以一人之力撰写了两部中国通史，贡献不可谓不大。

吕先生对自己的著作自省甚严。他晚年自评《吕著中国通史》说：“此书下册仅资联结，上册农工商、衣食住两讲，自问材料尚嫌贫薄，官制一讲，措词太简，学生不易明了，余尚足供参考。”今天，离顾先生撰写《当代中国史学》又过了七十多年，中国通史著述“很少能达到理想的地步”的情况，是否已有改观？或者说理想和满意总是相对的，而通史的著述，永远是未完成的，永远是暂时和过渡性的。人文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著述不总是单向度地新旧淘汰，一方面是新书新说层出不穷，一方面是旧著旧作不断翻印。在这里，很难说一定是“今胜于昔”“新胜于旧”。“此意深微俟知者，若论新旧转茫然”（散原老人诗）^⑥，况且有些地方，也无所谓新旧。我曾与同学说：“理科的书，越读越少；文科的书，越读越多。”何以如此呢？因为数理化的书是逐步“淘汰”的，有了现在新出的书，前人的旧著就可以不读了；人文学科的书是不断积累的，不能因为有了新书，前人的著作就可以不读了。近年来，民国时代学术著作的一再新版重印，或印证这一点，这也是今日重印吕先生这部《中国政治史》^⑦的意义所在。

张耕华

2014年7月

⑥ 严寿激先生有《此意深微俟知者——吕诚之先生史识述论》一文，原刊[日]《百年》总第4期（1999年7月），又收入严氏《近世中国学术思想抉隐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版。

⑦ 即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下部。



第一讲	中国民族的由来 / 001	第十九讲	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/ 119
第二讲	中国史的年代 / 007	第二十讲	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/ 123
第三讲	古代的开化 / 010	第二十一讲	唐朝的中衰 / 128
第四讲	夏殷西周的事迹 / 020	第二十二讲	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/ 133
第五讲	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/ 031	第二十三讲	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/ 139
第六讲	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/ 040	第二十四讲	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/ 145
第七讲	古代社会的综述 / 045	第二十五讲	北宋的积弱 / 151
第八讲	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/ 050	第二十六讲	南宋恢复的无成 / 159
第九讲	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/ 055	第二十七讲	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/ 169
第十讲	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/ 063	第二十八讲	汉族的光复事业 / 176
第十一讲	前汉的衰亡 / 072	第二十九讲	明朝的盛衰 / 181
第十二讲	新室的兴亡 / 077	第三十讲	明清的兴亡 / 187
第十三讲	后汉的盛衰 / 082	第三十一讲	清代的盛衰 / 194
第十四讲	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/ 089	第三十二讲	中西初期的交涉 / 201
第十五讲	晋初的形势 / 095	第三十三讲	汉族的光复运动 / 209
第十六讲	五胡之乱(上) / 101	第三十四讲	清朝的衰乱 / 218
第十七讲	五胡之乱(下) / 105	第三十五讲	清朝的覆亡 / 226
第十八讲	南北朝的始末 / 110	第三十六讲	革命途中的中国 / 233



第一讲

中国民族的由来

社会是整个的；作起文化史来，分门别类，不过是我们分从各方面观察；讲到最后的目的，原是要集合各方面，以说明一个社会的盛衰，即其循着曲线进化的状况的。但是这件事很不容易。史事亡失的多了，我们现在，对于各方面，所知道的多很模糊（不但古代史籍缺乏之时，即至后世，史籍号称完备，然我们所要知道的事，仍很缺乏而多伪误。用现代新史学的眼光看起来，现在人类对于过去的知识，实在是很贫乏的），贸贸然据不完不备的材料，来说明一时代的盛衰，往往易流于武断。而且从中学到大学，永远是以时为经、以事为纬地，将各时代的事情，复述一遍，虽然详略不同，而看法失之单纯，亦难于引起兴趣。所以我这部书，变换一个方法，上册依文化的项目，把历代的情形，加以叙述，这一册依据时代，略述历代的盛衰。读者在读这一册时，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，阅读上册就会略有所知，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，



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；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，亦更易于明了了。

叙述历代的盛衰，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。中国从前的历史，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、为相斫书，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。然而矫枉过正，以为这一方面，可以视为无足重轻，也是不对的。现在的人民，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。这话怎样说呢？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，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，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。在一个团体之内，虽然有更高的权力，以评判其是非曲直，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，在各个团体之间，却至今还没有，到被外力侵犯之时，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，此团体即所谓国家。一个国家之中，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、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，如实业团体、文化团体等都是。此等团体，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，是用不着分界限的，能合作固好，能合并则更好。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、掠夺人家的事情，我们没有组织，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、掠夺，而浸至无以自存了。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的原因。世界上的人多着呢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，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？这个原因，最重要的，就是民族的异同，而民族的根柢，则为文化。世界文化的发达，其无形的目的，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，但非一蹴可几。未能至于大同之时，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，通力合作，以共御外侮；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，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。在现今世界上，非民族的国家固多，然总不甚稳固。其内部能平和相处，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，其不然的，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；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，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，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。所以民族国家，在现今，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。若干人民，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，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坚固的国家，都是很不容易的事。苟其能之，则这一个国家，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，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

责任的良好工具了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，这是无待于言的。一个大民族，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，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。为中国民族主体的，无疑是汉族了。汉族的由来，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。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，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。至于记载邃古的时代，自然是没有的。后来虽然有了，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，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。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，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。如其开化较晚，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，这一个民族的古史，原可借那一个民族而流传，中国却又无有。那么，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，自然无从知道了。直至最近，中国民族的由来，才有人加以考究，而其初还是西人，到后来，中国人才渐加注意。

从前最占势力的是“西来说”，即说中国民族，自西方高地而来。其中尤被人相信的，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。此所谓黄河上源，乃指今新疆的于阗河；所谓昆仑山，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。这是因为：（一）中国的开化，起于黄河流域；（二）汉武帝时，汉使穷河源，说河源出于于阗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说，天子案古图书，河源出于昆仑。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，相信武帝所案，必非无据之故。其实黄河上源，明明不出于阗。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，南出而为黄河上源，则为地势所不容，明明是个曲说。而昆仑的地名，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，并不能实指其处，这只要看《楚辞》的《招魂》、《淮南子》的《地形训》和《山海经》便知。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，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，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，根据实在很薄弱。这一说，在旧时诸说中，是最有故书雅记作根据的，而犹如此，其他更不必论了。

